

# 從出版刊物看近五十年香港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Research o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Hong Kong : 50 Years of Publications

吳淑鈿 (Ng Suk-tin) \*

自 1950 到 2000 約五十年間，在香港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包括專書和學報、期刊、論文集以至報刊上的文章等，為數甚眾。<sup>1</sup>這些資料顯示了五十年來香港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面的成就，也表現了現代香港社會對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的積極態度。

以出版刊物為主體考察近五十年香港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以下簡稱「研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角度；刊物中有關資料雖不乏廣義範圍的研究，學術性或深或淺，但在「香港出版」的綱領下看「研究」的價值呈現，便突出了香港社會在特定時空中的集體文化意義。

本文「出版刊物」的討論範圍主要包括學報、期刊及論文集三個方面。專書及報章的資料暫不列此。五十年間，出版「研究」的這三方面的刊物共有 142 種，其中 130 餘種載有可供參考的出版史料，如「創刊詞」、「發刊詞」、或停刊時的結束宣言等。以下先從出版「研究」的刊物本身作考察，再從宏觀角度論述刊物出版的「研究」概況。先論一般社會文化刊物，再論學院刊物，盡量用以類相從的方法處理資料。通過兩部分的考察與論述，歸結具社會及學術價值的出版意義，並見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香港傳承的一面。

## 一、出版「研究」的一般文化刊物考察

除了學院內的學報及論文集等外，純粹出版「研

究」的學術性文化刊物很少，但半學術性的刊物中仍不乏相關著述。此外古典文學的研究主要寄生在文藝雜誌、教學及語文雜誌、政治文化刊物、宗教文化刊物、讀書雜誌及綜合性文化刊物中。事實上有些刊物是很難嚴格分類的，例如教學性的往往又以研究學術為宗旨，帶政治性質的刊物又不離講文化，而綜合性文化刊物中，有些嚴肅的學術氣味很重，有些則通俗性較大。以下試將各有關刊物大體劃分成幾個類型，並指出每一類型與「研究」的內在關係。

### （一）學術及半學術性文化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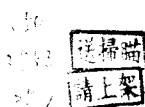
過往 50 年出版的學術和半學術性的文化刊物，以知識分子為模範讀者，帶著高遠的文化理想。如《人生》、《自由學人》、《抖擻》、《歐華學報》、《龍之淵》、《中國文化》、《中華國學》及《九州學刊》等。《自由學人》（1956-1958）是早期的學術性刊物，<sup>2</sup>作者皆為學院中人，如涂公遂、勞思光、余英時等，以思想哲學的論述為主。他們相信在 50 年代，經過歷史的苦難，中國知識分子已有相當的覺醒，在刊物中發表學人對種種學術文化問題的論著，對人類文化必定會多多少少有貢獻。<sup>3</sup>將深重的民族憂患意識擴大至人類前景的關注，具現高層次的文化襟懷。同期的刊物中，《人生》（1951-1971）亦展示了廣大的世界觀，他們明言讀者對象是上層知識分子，而創辦目的一在結合

\* 作者現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1 鄭健行、吳淑鈿《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詩詞曲篇》〈總序〉指出其數約為四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4），頁 5。

2 標示刊物出版的時代，只記年份。出版壽命少於一年者才加記月份。

3 《自由學人》「發刊詞」（1956.8），頁 1。



旅外學者提煉中國文化精華、檢討歷史，二在求中西文化會合，三在正人心、救世運。<sup>4</sup> 這種立足香港、聯繫海外、放眼世界的文化觀念，一直是 50 年代以後大部分刊載「研究」的刊物的主體出版理念。《抖擻》（1974-1983）是 70、80 年代的半學術性文化刊物，創刊也是爲了向海外中國知識分子提供出版園地，交流知識與觀點。<sup>5</sup> 而《歐華學報》（1983-1993）則意在促進中歐文化的交流作用。古典文學既是中國文化的精華所在，這類刊物與「研究」的關係最是直接與密切。

《九州學刊》（1986-1993）、《龍之淵》（1988-1989）、《中華國學》（1989-1990）和《中國文化》（1989-1995）都是 80 年代出版的學術文化專刊，以研究中華文化爲共同宗旨。但此四種刊物在出版「研究」方面呈現的香港本土性明顯不強。《中華國學》雖說由「香港國學研習社」出版，以「溝通國內外漢學研究成果」爲使命，但其作者群與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文化》一樣，以國內學者居多。《龍之淵》的出版雄心最大，創設巡迴總編輯制，請「全世界各國的漢學優秀人才」開闢「屬於世界人民的漢學園地」，然而在刊載「研究」上則未能清楚顯示其本土性。<sup>6</sup> 《九州學刊》由香港中華文化中心出版，其言謂旨在促進學術和思想觀點的交流，則的確是兼採了一些當時在海外而後來成爲香港的學者的論述，但本土性亦欠鮮明。

## （二）文藝及文學雜誌

出版「研究」的文藝和文學刊物爲數不少，僅次於綜合性文化刊物。如《熱風》、《文學世界》、《文藝世紀》、《海光文藝》、《文萃》、《純文學》、《詩風》、《海洋文藝》、《青年文學》、《詩與評

論》、《文學家》、《文學與傳記》和《香港文學》等。這類刊物的共同特點是大多以刊載文藝創作為主，以培養香港新作家或發表成名作家新作爲職志。所謂「研究」，一般囿於古典文學作品的評介，多屬賞析之類的討論。其中 50 年代創刊的《文學世界》（1954-1965）出版宗旨最嚴肅，論述最質實。黃天石在〈世界文學與文學世界〉（代發刊詞）中宣言：「世界是文學創造出來的，文學要有共通的世界性，以世界文學來建立更理想的文學世界……文學在一個民族裡所撒下的種子，當初沒人注意，年代久遠，便凝結成爲一個民族的靈魂，再擴大而爲全世界人類的靈魂。」<sup>7</sup> 認爲文學有極爲重要的社會功能。各刊物中，《文藝世紀》（1957-1969）和《海洋文藝》（1974-1980）的「研究」資料都相當可觀，前者雖在稿約中明言接納「古典文學研究的論文」，所刊作品亦不出賞析範圍。《詩風》（約 1972-1984）是香港本土詩人刊物，研究範圍自是圍繞著古典詩歌。《純文學》（1962-1972/1998-2000）雖因「香港出版業蓬勃，文學花園荒蕪」而創刊，要「負起歷史上偉大的任務」。<sup>8</sup> 但約稿的既都是成名作家，研究部分也是以當時臺灣及海外學者的著述爲主。

## （三）教學及語文雜誌

考查 50 年代以後的香港教學雜誌，兼載「研究」資料的主要有《中文通訊》、《教育曙光》、《現代教育通訊》、《新語文》、《中文學習》、《孔道專刊》、《中國語文研究》、《語文雜誌》和《中國語文通訊》等幾種。此等刊物的共同出版目的是提高香港社會的中文教育水平，研究中文教學，讓教師通過刊物交流教學經驗，故「研究」範圍不乏中學教材的古典文學

4 《人生》（1951.1），頁 1。

5 《抖擻》「發刊詞」（1974.1），頁 1。

6 《龍之淵》「本刊總編輯輪流做莊制」，1988 年第 1 期，頁 1。所謂「本土性」，以本土學者及本土作者發表的論述爲主。廣義言之，出版刊物中「研究」資料的作者，無論其爲大陸、臺灣或海外的身分，都屬「香港出版資料」的作者。由於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早期居民的流動性又相對較強，亦無從掌握所有學者和作者的生平資料，故我們就所搜查的資料，把曾留居香港，及曾任教於香港大專院校的作者資料稱爲本土性資料，也只能是一個概括的分法，一些在刊物中以筆名發表文章的資料則無從定位。

7 《文學世界》（1954.4.11），頁 1。

8 〈作品·作家·讀者·時代〉，《純文學》（1967.4.1），頁 1-2。

選文。《中文通訊》（1954-1990）和《教育曙光》（1961-）都屬香港教師會刊物，出版期都長達40年，但即使宣稱以研究學術為宗旨，「研究」的資料卻少之又少。相同情況見於《現代教育通訊》（1970-2000）、《中文學習》（1975.9-1975.12）和《新語文》（1970-1972）這些以討論教材為主的刊物中。<sup>9</sup>《孔道專刊》（1977-1987）乃民間教育機構出版，意在證明社會上中文寫作興趣不遜於英文，所載資料數量在同類刊物中較為可觀。<sup>10</sup>《語文雜誌》（1979-1986）由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出版，與中文大學中國語文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國語文研究》（1980-1995/2001-）和《中國語文通訊》（1989-）相同，致力提高社會語文水平之餘，也關心文學的藝術語言研究，作者皆大學教師。但《中國語文研究》側重促進中國語文研究成果，資料所見，作者皆為海外學者，欠本土「研究」顯示。

#### （四）政治及宗教文化刊物

在香港，幾乎與「研究」有關的絕大部分刊物都表示不願與政治掛勾。《民主評論》、《祖國周刊》、《祖國月刊》和《中華月報》都是50年代早期特殊政治環境下出版的文化刊物。徐復觀在1966年9月《民主評論》（1949-1966）的結束語中說最初是本民主政治理想而創刊，他向蔣介石建議在香港辦一份刊物，為的是在黑暗的政治環境中，在思想上開一線光明與希望。五六年後雜誌的政治色彩漸轉稀薄，變成在憂患意識中專談中國文化問題，多在文化反省方面做功夫。<sup>11</sup>《祖國周刊》1953年創刊，原來宗旨在致力民主中國運動。1964年改為月刊，以研究大陸問題為主。20年後再改為《中華月報》（1973-1975），致力於推動海外中華自由文化運動，但堅稱「不可能架空研討文化思想，而不接觸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sup>12</sup>

《國風》、《文藝雜誌》、《法言》乃具宗教背景的文化刊物。前兩種屬基督教。香港聖公會會督在《國風》（1950）的創刊詞中有藉宗教以保香港「偉大城市」地位的祝願。<sup>13</sup>《文藝雜誌》（1982-1986）辦刊目的則是讓基督教思想與中國文化思想彼此交融。《法言》（1986-1992）屬佛教文化刊物，兼載佛教及中西文化學術著作。「研究」只兩種，都討論佛教思想與古代文人的關係。

#### （五）讀書雜誌

《天地叢刊》、《開卷》、《書海》、《讀者良友》和《讀書人》都屬讀書雜誌一類。這類刊物大部分由具規模的圖書公司出版，如天地圖書公司（《天地叢刊》1978-1979）、商務印書館（《書海》1984-1989）、三聯書店（《讀者良友》1987-1997）等，目的在推廣讀書風氣、提供書目和評介書籍等，故「研究」資料性質多為書評序跋或校記之類，當中亦不乏本港學者的論述。

#### （六）綜合性文化刊物

綜合性文化刊物是為數最多的出版「研究」的一般刊物類型，有《文壇》、《展望》、《新語》、《知識生活》、《明報月刊》、《廣角鏡》、《大華》、《人物》、《人物與思想》、《筆端》、《青年雜誌》、《晨風》、《盤古》、《七十年代》、《南北極》、《中國人》、《耕耘》、《大成》、《波文》、《新風》、《萬象》、《中報月刊》、《百姓》、《滬息鏡》、《九十年代》和《中華文摘》等廿餘種。這類刊物的出版或多或少均載負著時代和社會的使命感，重視內容的知識性和趣味性，藉此介紹新事物新思潮，趕上新時代。然而比起以上各類型的刊物，這個群類的主軸

9 《現代教育通訊》和《中文學習》都屬教育出版社的刊物，《新語文》是中華語文學會刊物。

10 由孔聖堂出版。專刊乃為出版國學研習班與徵文比賽論文選篇，要證明在香港國學仍受重視，中文寫作興趣也未退減。見〈發刊詞〉（1977.10）。資料共25種。

11 《民主評論》「本刊結束的話」（1966.9），頁214。

12 〈談海外中華自由文化運動——代發刊詞〉，《中華月報》（1973.4），頁4。

13 《國風》只在香港大學找到館藏一期。堅信國家的愛和對上帝的愛聯合起來，可對抗金錢的貪婪，二者如能在香港的英國和中國市民心中加強並發展，香港能保偉大城市地位。

性質最參差；它們之中有些強調為年輕人辦刊，<sup>14</sup>有些只為出版而出版，<sup>15</sup>有些側重評論社會問題，有些則強調不涉政治。<sup>16</sup>最顯著的特點是它們早夭者甚眾。由60至80年代，出版壽命只維持在一、二年間的刊物竟佔半數。而另一極端現象，是餘下的都屬長壽刊物，且能維持出版期在十至三十多年之間。<sup>17</sup>由發刊宗旨考察壽夭懸殊的不同境遇，除了經濟背景外，不難發現長壽刊物的共同特點是能具廣闊的視野，文化的關切，尤其中國文化與世界的關聯。如出版壽命相對短暫但也維持了八年的《中報月刊》（1980-1987），其發刊詞便指出從文化角度看，香港既有思想言論自由，能對中國對世界有影響，可起聯繫作用。<sup>18</sup>又持續出版逾三十年的《明報月刊》（1966-），其編輯精神亦重視數千年中華文化的傳統和價值，因為這是全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寶貴遺產。<sup>19</sup>無論如何，在這類刊物中，「研究」是在社會使命感呈現的層面上，藉探討和介紹中國文化的切面融進出版篇幅中去的。

綜觀以上各類社會文化刊物，出版初衷儘管各有不同，但我們仍可自其中發掘其共性所在，即對人類前途的普遍關懷。這體現在它們顯示的社會意識、知識追求、教育責任感、思想與信仰的探索、文化的保存與交流、世界視野等等。過去香港曾在特定時空中佔中西文化交流的優勢，大部分的刊物都希望在這優勢中起著橋樑作用，像《九十年代》（1984-1998）所說的，面對90年代的挑戰，與時代脈膊一起跳動。<sup>20</sup>中國傳統文化價

值的肯定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基石，古典文學的研究便是在這樣的一種文化理想中被納入「交流」的版圖。故雖然原非刊布主題，「研究」資料在五十年間終能聚流成川，成為香港此西化殖民社會中的一朵文化奇葩。

## 二、一般文化刊物的「研究」

從宏觀角度看一般文化刊物的「研究」出版，往往牽涉不同時期香港社會文化發展的特點。大體言之，70年代是五十年間一個分水嶺。70年代的香港社會，被稱為「火紅年代」。從歷史看，是文革中國的一片邊緣綠洲。帶著殖民地的標籤，一方面享受著自由與開放，一方面時刻關心大陸覆在紅旗底下的神祕與駭浪。從社會看，歷練50年代以來的普遍貧窮，60年代的工業發展，此時人口不斷增加，男女同工同酬，財富開始積聚。經過中文運動、保釣運動及其他社會運動等抗爭，社會意識日益濃厚。從教育看，由小學到初中，九年普及免費教育逐步實施，中文大學遷集沙田。從文化看，中文取得合法地位，與英文同為香港的法定語文。香港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佔重要作用，50年代前已有長遠歷史。<sup>21</sup>於此更由殖民社會邁步向前，漸漸晉身國際化都會，商業成為城市重要經濟命脈。<sup>22</sup>

刊載「研究」的百餘份刊物中，逾半是50至70年代出版的。其中大半屬一般社會文化刊物，佔50份。換一個角度說，在此類文化刊物的總數量中，50至70

14 如《新語》、《知識生活》、《青年雜誌》、《耕耘》、《波文》等。

15 如《波文》、《新風》。

16 如《盤古》出版宗旨之一是評論香港中國以至世界問題，聲明不涉政治如《明報月刊》、《人物與思想》、《中國人》、《耕耘》、《萬象》、《中報月刊》等。

17 出版期逾十年的有《文壇》（1955-1974）、《展望》（1958-1983）、《明報月刊》（1966-）、《大華》（1966-1971）、《盤古》（1967-1978）、《七十年代》（1970-1984）、《南北極》（1971-1996）、《中國人》（1972-1981）、《廣角鏡》（1972-）、《大成》（1973-1995）、《百姓》（1981-1994）、《九十年代》（1984-1998）。

18 《中報月刊》「發刊詞」（1980.2），頁1。

19 《明報月刊》「發刊詞」（1966.1），頁1。

20 《九十年代》內頁副標題（1984.5）。

21 參閱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導論」（香港：中國學社，1961），頁1-15。

22 劉蜀永在《簡明香港史》中指出：「香港經濟結構在70年代以後發生了巨大變化，迅速從工業化經濟發展成一個以加工工業為基礎，外貿為主導，金融、航運、房地產建築和旅遊等行業多元化發展的經濟結構。」（香港：三聯書店，1998），頁289。

年代的佔了四分之三。出版於 80 年代以後的，只有 20 餘份。這樣的出版現象說明 80 年代前，古典文學的欣賞與探討在不少刊物中佔一定篇幅。這在歷史上是有跡可尋的。羅香林在〈中國文學在香港之演進及其影響〉中便曾指出 20 世紀早期香港在中國文學上的貢獻：「以其發育於新聞界之政論與詩文小說，故其讀者普遍，而撰作迅速……以其發揚於大學與書樓之專門講授，故其研討廣博，而感發遙深。」<sup>23</sup>「發育於新聞界」之後，社會上的文化刊物有了「研究」的繫繫果實，而「發揚於大學與書樓」則澤及後世學院刊物的「研究」出版。余英時在〈香港與中國學術研究〉中亦指出自 19 世紀中葉，香港便為中西學術文化的溝通提供了最理想的地點。又說：「香港在日常生活中一直與時俱新，然而對於古老傳統卻沒有發展出一種除惡務盡的態度，這恐怕正是香港的文化潛力的所在。」<sup>24</sup>

受殖民政治與商業經濟的影響，長期以來，香港恆被稱為文化沙漠。60 年代論者在談香港的文化風貌時，已直指香港不是一個文化城。<sup>25</sup> 但我們仍可以非常具體地由「研究」的出版反映過去半個世紀，香港社會中「雅」文化的內涵與遷變的一面。80 年代以前，學術性的文化刊物中，《人生》的資料最多，達二百餘種。寫作方式多屬漫談欣賞釋義之類，大部分是短篇，或用連載方式分期刊出，如潘重規〈樂府詩粹箋〉、何敬群〈益智仁室論詩隨筆〉、鄧中龍〈唐詩偶釋〉、梁宜生〈韓愈傳略〉、王禮卿〈詩衛風旨釋〉、黃華表〈清代詩人別傳〉和楊胤宗〈九章〉釋義等。《抖擻》刊行十年，作者中不少是教育工作者。在科學、哲學、歷史、社會和語文的各種報導或論述中，有近 60 種「研究」資料，包括一些外地學者如葉嘉瑩、程千帆、興膳宏、徐朔方及本地學者如李家樹、黃兆漢、何冠驥等的篇章。80、90 年代其他的學術刊物如《中國文化》和《九州學刊》等，如上所述，主要是非本土學者的論述。

文藝及文學雜誌除了《文學與傳記》、《香港文學》及 98 年復刊的《純文學》在 80 年代後維持出版外，其餘皆 70 年代及以前的刊物。<sup>26</sup>《文學世界》有百餘種資料，皆當時院校學者的著述。如易君左論《詩經》，曾克崑論杜甫與李白，王韶生論王維詩，勞思光論宋詞流派，金達凱論東坡詞，饒宗頤論顧亭林詩，何敬群論清代傳奇。也有當時年青學者如羅錦堂論北曲小令，鄭利安（士元）論《典論·論文》，陳炳良昆仲編杜詩書目等等。「研究」成果蔚然可觀。《文藝世紀》和《海洋文藝》的作者群多用筆名，尤以前者為衆；「研究」附隨在「文藝叢談」的欄目中。《海洋文藝》有幾個穩定的作者，如學者羅忼烈，其他有思嚴、葉如新和姚芳。其中 1979 年有施蟄存的 3 種資料。<sup>27</sup> 資料寄生在「論壇·講座」的專目中，淺近得來又比《文藝世紀》的較為詳細。《詩風》的資料範圍絕大部分是詩經到唐代的詩。有黃國彬、胡燕青、黃維樑的作品。外地作者的資料中，包括臺灣李辰冬的論詩經和王紅公的論杜甫。<sup>28</sup>《純文學》資料近 80 種，見於每期的「論述」或「隨筆」中，大部分載於 72 年前各期，臺灣和海外的學者論文有葉嘉瑩、陳世驥、夏志清、葉珊、葉慶炳、林文月等。復刊後則只有葉嘉瑩和陳永正的幾篇。《文學與傳記》和《香港文學》的資料只各一種。可見 80 年代後資料零落，差別懸殊。

教學及語文雜誌中，要到 70 年代後期出版的《孔道專刊》和《語文雜誌》才有較多的「研究」資料出現。前者 20 餘種，作者群只六、七位，以詩文短論居多，如郭霖沅〈柳宗元之文學觀〉、何沛雄〈讀陶淵明的閑情賦〉、陳耀南〈陳白沙的文論〉等。後者十餘種，作者有陳炳良、陳志誠、范國等。1980 年有松浦友久的一篇〈「爺娘妻子走相送」——唐詩中的白話及厭戰詩的觀念〉。中文大學的兩本語文雜誌皆 80 年代後出版，《中國語文通訊》兼有中大學者和外地學者的資

23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頁 212。

24 余英時，〈香港與中國學術研究〉，《二十一世紀》17 期（1993），頁 5、6。

25 黃濟泓，〈香港文化風貌談〉，《盤古》5 期（1967.7），頁 14。

26 《詩與評論》在 1984 年出版，只一期。《文學家》出版期亦只維持在 1987.3-1987.11。

27 〈李後主〔臨江仙〕〉（1979.5.10）、〈蘇東坡〔洞仙歌〕〉（1979.6.10）、〈後唐莊宗〔如夢令〕〉（1979.11.10）。

28 李辰冬〈詩經研究二十蔽〉（1982.6-1983.10），王紅公〈杜甫論〉（1979.6）。

料，共 21 種，其中由何文匯肇始的蘇軾〔念奴嬌〕格律討論佔 6 種。

政治文化刊物都出版於 50 至 70 年代間。出版於 50、60 年代的《民主評論》資料近百。以徐復觀和金達凱的作品最多；徐復觀論中國詩歌境界、李義山〈錦瑟〉、韓偓《香奩集》、莊子藝術精神等等，金達凱論《詩經》、《楚辭》、建安詩、金元明各代詩及散曲等等。此外唐君毅、牟宗三、趙岡、饒宗頤、何敬群、梁寒操、梁容若等一時學者文人都有論述，亦有少數外地著名學者資料如許世瑛、陳寅恪、李辰冬等。《民主評論》的資料形態相對於《文學世界》的長篇論文，屬較短的論述形式，每期一篇，插在政治經濟教育及「中共動態」等專欄中。《祖國周刊》和《祖國月刊》中，帶政治意味的「研究」有趙聰〈中共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再批判〉、陳風〈中共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再批判與繼承〉、鍾華敏〈郭沫若詭辯論蘭亭〉、陳沛〈中共怎樣看待紅樓夢〉、崔一鳴〈中共對詩經的研究〉等幾篇。《中華月報》也有岳騫一篇〈也談中共批判水滸傳〉。此外《紅樓夢》的資料有 10 種。包括潘重規的 4 篇：〈論列寧格勒抄本紅樓夢的批語〉、〈「近年的紅學述評」商榷〉、〈「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答余英時博士〉和〈列寧格勒藏抄本紅樓夢中的雙行批〉，和余英時〈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章曼〈李、藍的《紅樓夢評論集》〉、四近樓〈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陳炳良〈近年的紅學述評〉、崎石〈曹雪芹未必有反清意識〉、趙岡〈曹雪芹的民族主義思想〉等各篇。當中潘、余、趙和四近樓（主）都是 70 年代《紅樓夢》論爭的主要人物。《中華月報》是潘、余論爭的戰場。<sup>29</sup>

《文藝雜誌》及《法言》等宗教文化刊物的資料，皆刊於 80 年代後，只有 5 種，全是本港學者的論述。讀書雜誌的資料亦主見 80 年代後，全部共 40 種。但與

其說這些資料部分程度反映了 80、90 年代社會上的讀書風氣，毋寧說它們是本港圖書市場競爭的一種工具，<sup>30</sup>是最後遺留的集體文化價值充實了它的出版意義。

綜合性文化刊物中，絕大部分都出版於 50 至 70 年代。80 年代前後創刊的只有《中報月刊》、《百姓》（1981-1994）、《滄息鏡》（1982-1983）和《九十年代》。90 年代則只《中華文摘》（1992-）一種。雖然有半數刊物在 80 年代後不復出版，但總的來說，在一般文化刊物中，這類刊物的「研究」陣容仍是最大的。資料的特點是其論述屬普及性質，多短篇，作者多用筆名，間有本地或外地著名學者執筆，而題材多以詩詞和古典小說為主。70 年代這類刊物中的資料內容有兩方面值得注意。一是論者對郭沫若 1972 年出版《李白與杜甫》的意見。《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的〈詩詞曲篇序〉中曾有歸納：「圍繞郭書的討論出版於 70 年代特別是 1976 年以前的香港期刊中，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是那時候中國文學研究的意識型態主流以外的另一種聲音。」<sup>31</sup>二是關於《紅樓夢》的討論。70 年代一般刊物中論述《紅樓夢》的篇章特多，尤以《大成》（1973-1995）、《南北極》（1971-1996）、《七十年代》（1970-1984）、《中報月刊》和《明報月刊》的資料最豐。捲入當年幾個論辯旋渦中的刊物還包括政治文化刊物類的《中華月報》，和學院刊物中的《中文大學學報》、《紅樓夢研究專刊》。論爭大概見於《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小說、戲曲、散文及賦篇》的序文中。<sup>32</sup>

80 年代仍保持出版的綜合文化刊物有《展望》（1958-1983）、《明報月刊》、《廣角鏡》（1972-）、《大成》、《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南北極》、《百姓》、《中報月刊》、《滄息鏡》和《中華文摘》等。90 年代後則只餘《明報月刊》、《廣角鏡》和《中華文摘》3 種。在所有的一般文化刊物中，《明

29 詳見吳淑鈿，〈小說戲曲散文及賦篇序〉，載《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小說、戲曲、散文及賦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4），頁 2。

30 三聯、商務、天地和中華是香港圖書四大門市。（《讀者良友》、《書海》、《天地叢刊》都是他們出版的推廣讀書刊物）。陳不諱，《香港出版業》（香港：彩色世界出版公司，1989），頁 94。

31 《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詩詞曲篇》，頁 9。

32 《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小說、戲曲、散文及賦篇》，頁 2。

報月刊》的出版壽命最長，作者群大都是一時學者與文人。358種資料中，詩詞曲與小說仍佔多數。其他古典文學研究範圍亦廣泛包涵，大都是具學術價值的討論。直到90年代，相對於其他一般刊物中所載資料，它儼然是僅存的碩果了。就資料看，《明報月刊》80年代前後的資料比例約是四比六，有別於其他一般文化刊物。資料聚集的原因之一顯然是同期同類刊物亡散之故。

總覽一般文化刊物的「研究」，80年代前的資料比較豐富。《人生》、《文學世界》和《民主評論》是前期篇章最多的刊物。《明報月刊》的出版期維持最長，是80年代後資料最多的刊物。從時代劃分的角度看一般文化刊物的「研究」，有兩方面值得再補充。一是資料的消長與刊物的出版生態有關。60、70年代，不少滿懷理想的知識分子都有一種社會及文化上的承擔精神，願意通過出版刊物來探討文化問題。如《盤古》，蔡康平在〈開關與承擔——謹賀「盤古」之誕生〉說：「近年來許多雜誌都倒閉了，還有不少也快走到盡頭了。今天連一份可看的中文雜誌都沒有，這不能不說是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老一代的知識分子問題好像發完了，新一代似乎接不上問題了，腦子是空虛的，思想是貧乏的。」<sup>33</sup> 表現了「這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又如《知識生活》的發刊詞〈生命·價值·理想〉：「時代苦難中我們應肯定人類的理性，肯定文化，肯定歷史……我們固守的原則：肯定理性，肯定科學、民主、民族感情、傳統文化。」<sup>34</sup> 出版的心意是熾熱的，辦刊物者都有著一顆民族心，把刊物視作中國文化的火種。這類文化刊物在80年代後普遍零落，從刊物本身看，無法維持出版，主因可能是經濟上的無以為繼。事實上不少刊物的停刊主因便是「窮」，如梁宜生說，《人生》十九年來，和窮分不

開。<sup>35</sup>《自由學人》1957年10月開始便經費困難，未能按時出版。<sup>36</sup>《大華》的編輯太忙，因為要還文債賺錢，艱苦經營，錢都蝕光了。<sup>37</sup>《人物與思想》的〈讀者·作者·編者〉先是訴說經濟困難，再而發起捐款運動，但結果終於還是停刊了。<sup>38</sup>《文藝雜誌》是基督教雜誌，最後也因成本過高而停刊。可見這類刊物的生存空間不易維持。

二是從刊物資料的消長，我們可以看到70年代前後香港社會雅文化一個側面的變遷。資料數量和寫作隊伍具體反映早期社會人士對古典文學的廣泛興趣；作者群既有學者或大學生，也有教育工作者或一般文人。無論是嚴肅的中短篇學術論文，或只詩文餘事，叢談小調，它們都被那個時代的編者和讀者接納了，在整體社會文化中佔一個或大或小的位置，提供一種由傳統文學散發的古典的品味。80年代後這部分的資料隨刊物的漸次消失而減少，資料庫中整體的研究無疑變得專精，但精品都入了學院學報的殿堂，文化刊物中猶存的則多屬外地輸入的資料。這確是廿年來社會文化品味轉變的一個切實反映。一個社會文化的轉變，所牽涉的固然非常複雜。例如早期學者文人在這類刊物中的大量論述，可能包藏了一種政治性的心理功能在內；他們將50年代被迫遷離大陸後的反省沈澱在文化失國的根蒂上，欲藉古典文學以恢復或加強對傳統文化的體認，期望有機會改變政治前景。但單從文學傳統的角度說，這「研究」的現象是弔詭的。當香港仍處在中國的邊緣，以殖民地的曖昧身分閱讀唐詩宋詞時，熱情澎湃，暢談高論。等到遠處吹起回歸的號角，那熱情卻漸漸冷淡下來了。1984年是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的一年。無獨有偶，在此之後，除了《中華文摘》、《九州學刊》、《中國文化》和幾份讀書雜誌之外，已沒有多少與「研究」有關的刊物創辦了。<sup>39</sup>

33 《盤古》創刊號（1967.3），頁7。

34 《知識生活》（1963.9），頁1。

35 《人生》（1969.6.1），頁1。

36 《自由學人》（1957.10），頁1。

37 《大華》（1970.7），頁2。

38 《人物與思想》（1973.7），頁3。

39 80年代前後創刊的刊物中，《中報月刊》創刊於1980年，《百姓》創刊於1981年，《滄息鏡》創刊於1982年，《九十年代》創刊於1984年。

無論如何，這類刊物一直載有非本土作者的資料，具體說明香港長期以來文化開放的出版意識。70 年代前的香港，在大陸社會仍未開放的時候，在文化交流上扮演重要角色。藉著刊物中的這些資料，聯繫著各地學者文人，對中國傳統文學進行切磋與探索。這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中，透現一種薪火延續的民族責任感，有深刻歷史意義。時至今日，文學在社會的空間越來越小了。如洪清田說：「影音視象的媒介取代了文字和文學的大部分時間和空間。文字和文學的疆土越來越小，在原有的領域裡也大幅被影音視象滲透和稀釋。電子媒介早已沒有文字和文學的獨立地位，連報紙雜誌也極少。」<sup>40</sup>

### 三、出版「研究」的學院刊物考察

過去五十年，出版「研究」的學院刊物共 70 餘種，約佔總資料庫半數的比例。所謂學院刊物，是廣義地指與學術機構有關聯的刊物。除了大專院校及民間學術團體出版的學術期刊和論文集外，也包括學院的學生刊物。此中學院學術論文集的出版情況比較複雜，既有由學術單位直接出版，也有由書局出版、論者自行印刷、或由贊助機構出版，甚至以電子版形式出版等。但這些只反映了出版背後的經濟運作模式，與「研究」本身無關。學生刊物則有學生自行出版的學會刊物，和由學院出版的學生論文集兩種。以下就搜得的學院刊物資料作分析。

#### （一）學術期刊

五十年間，與「研究」有關的學院學術期刊數量相當可觀。有《東方文化》、《新亞學報》、《廣僑學報》、《新亞書院學術年刊》、《崇基學報》、《香港浸會學院學報》、《聯合書院學報》、《珠海學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中國學人》、《香港中文大學學報》、《新亞學術集刊》、《能仁學報》、《香港大學中文系集刊》、《人文學刊》、《香港浸會學院中文系集刊》、《嶺南學院中文系系刊》、《人文中國學報》、

《中大人文學報》、《嶺南學報》、《樹仁文史專刊》、《樹仁學報》、《譯叢》和《中文學刊》等 25 種。反映中文學術圈子的研究成果發表空間一直不缺。

香港大學成立於 1912 年，是本地第一所大學。《東方文化》是五十年間最早的大學學報，1954 年 1 月開始，由香港大學出版社為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刊行。除文學外，刊載歷史、美術、語言、哲學、建築、考古、經濟與政治各範疇的中英文學術研究成果。所以雖是歷史最悠久的大學學報，「研究」資料所佔篇幅並不特別豐富。廿餘篇論文中 70、80 年代的佔了三分之二，絕大部分是香港大學中文系師生的著述。《香港大學中文系集刊》由港大中文系出版，是同人學術刊物。由 1985 至 2000 年間共印行 4 期，資料 14 種，更具體地反映了港大學者多年研究成果。

《新亞學報》1955 年 8 月創刊，與《東方文化》同為本港「老牌」學報。不同的是它「以考據義理並重的國學為主，又以平等態度將中學西學融之一爐」。近半世紀中「研究」資料凡 39 種，不少是當代著名學者如錢穆、柳存仁、饒宗頤和潘重規等的論述。《中國學人》（1970-1977）也是新亞研究所的學報。唐君毅在〈說學術研究之歷程與其成果——學術之顯晦與當前中國學術研究所處之時代情勢〉（代發刊辭）中指出它與《新亞學報》的分別，是後者乃年長學者將自謂成熟之見，以就教當世。而《中國學人》則以較年輕的一代學人為主幹，<sup>41</sup>「研究」資料 15 種。《新亞書院學術年刊》（1959-1977）的作者群與《中國學人》幾近相同。《年刊》旨在刊布新亞書院師生學術論文，共出版 19 期，「研究」資料 26 種。這三種學報的主要作者均為新亞師生，反映當年錢、牟諸先生「新亞」一脈對本港中文學術研究的重要貢獻。《新亞學術集刊》是新亞書院繼《新亞書院學術年刊》後出版的學報，編輯方向和後者有所不同，每期論文環繞特定專題而編纂，自 1978 年刊行。「研究」資料雖有 34 種，但其中不乏臺灣、大陸及其他各地學者的著述。此外新亞書院自 1958 年開始印製的校園刊物《新亞生活》中，有相當多的學生討論文章，也有學者如錢穆和潘重規等的論述。

<sup>40</sup> 洪清田，〈文學的前途和西九龍文化地標〉，《明報》副刊「時代」版（2003.12.12）。

<sup>41</sup> 《中國學人》（1970），頁 13。

《崇基學報》（1962-1976）和《聯合書院學報》（1962-1975）是崇基書院和聯合書院的綜合性學術刊物，出版期同在中文大學成立前一年，資料份量也相若，皆以刊載大學師生論文為主。另《崇基校刊》（1951-1992）和《聯合校刊》（1960-）雖以報導校園實況為主，在「論述」和「特稿」的專欄中，亦載學者「研究」資料十數種。中文大學於1963年成立後，曾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學報》（1973-1979），「研究」資料9種，其中有1974年余英時兩篇介入當年紅樓夢論爭的作品：〈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和〈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68-1991）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92-）的分別，在於前者乃該所同人學報，是「研究工作結果發表園地」。1992年改革後，兼徵收外稿，刊載中國人文科學及社會科學之純學術論文及書評。總覽前後卅餘年的「研究」資料，這是資料庫中藏量最豐的一份學報。值得注意的是它的作者群仍以香港學者佔大多數，80種資料中佔逾60種。《人文學刊》（1991-2001）和《中大人文學報》（1997-1999）都是中文大學文學院出版的學報。後者出版了3卷，之後被《人文學刊》吸收。人文的關懷是刊物主旨，古典文學的論述則頗有限。至於《中文學刊》（1997-），乃中文大學中文系出版，由於是一份國際性學術期刊，故在2000年前出版的2期中，「研究」有一半屬外地學者的著述。此外 *Renditions*（《譯叢》1973-）乃中文大學翻譯中心出版，內容包括將中國古典文學介紹與西方讀者的論述。

《香港浸會學院學報》（1962-1987）是香港浸會大學前身的學院學報，主要刊載早期任教學者的著作，資料凡24種。《香港浸會學院中文系集刊》（1992）則是中文系師生學術刊物，只出版了1期。浸會學院在1994年成為大學後，創辦《人文中國學報》（1995-），以「鼓動及啓導天下反省和提昇中國文化」為旨要，屬文史哲範圍的國際性學術期刊。24種資料中，大部分屬香港學者研究。

《嶺南學院中文系系刊》（1993-1997）和《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1998-）是嶺南大學成立前後中文系的學術刊物，共出版了5期，皆屬本港學者著述資料。《嶺南學報》（1999-）兩期的14種「研究」中，本港學者資料約佔半數。

《廣僑學報》、《珠海學報》、《能仁學報》、《樹仁學報》是香港私立大專院校的學報。《廣僑學報》（1956.9）是廣僑書院的學報，在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的圖書館都只藏一期。資料只有兩則王韶生的書評。珠海、能仁和樹仁都是迄今開辦有年的書院，《珠海學報》（1963-1988）和《能仁學報》（1983-）的資料相當，都有19種。前者共出版了16卷，後者最初由羅時憲和鍾應梅出版了兩期，隔了十年，1994年才再由葉龍繼續出版，是佛學和文史哲範疇的師生學術刊物。另《能仁校訊》（1982-1985）也有相關論述7種。《樹仁學報》（2000-）是樹仁學院繼《樹仁文史專刊》（1996）後正式印行的年輕學報，刊載學院教師及訪問學者的論文，兩種刊物資料有9種。

## （二）學術論文集

比起大學學報，與古典文學有關的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是「研究」資料的收藏庫之一。如《中古史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5）、《近三百年中國文學研究論集》（珠海書院中國文史研究所學會，1985）、《香港語文教育學院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教育署，1990/91/92）、《國際隋代唐五代史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1）、《饒宗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7）、《中國小說與宗教》（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1998）、《方法論於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的應用》（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9）、《中國詩歌與宗教》（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1999）、《方法論與中國小說研究》（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0）、《九十年代兩岸三地文學現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0）和《屈原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2000電子版）等。但學術研討會既具交流性質，與會者很多是外地學者，反映在這些論文集的資料中，便相對上不能顯示純粹的本土性，故香港學者的資料所佔份量有限。

比較之下，《饒宗頤教授南遊贈別論文集》（1970）、《錢穆先生九秩榮慶論文集》（1986）和《慶祝饒宗頤教授七十五歲論文集》（1993）是五十年間帶著深厚情味出版的論文集。其中皆錢、饒二公友儕弟子的論述，本土性清晰，資料10種。*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Fiction*（1980）出版性質亦相同，乃李田意

教授的學生為慶祝他 65 歲生日而呈獻的論文集，紀念他在美國研究及推介中國古典小說的成就。

大專院校的紀念文集中不乏文史論文，「研究」資料數種，如《香港大學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1964-68）、《珠海書院四十周年紀念集》（1987）和《聯合書院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1989）等。學海書樓是民間學術機構，由早期香港大學講師賴際熙太史（光緒 29 年進士）於 1923 年倡辦，既以藏書，且為講學。《學海書樓七十周年紀念文集》（1993）有資料 1 種。

此外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1987）和中文大學的「中國語文叢書」系列的《大江東去——蘇軾念奴嬌正格論集》（1992）亦各有資料 1 種。

### （三）學生刊物／論文集

刊載「研究」資料的學生刊物大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各大專院校的中文系學生出版刊物，其中有一些是師生合作編製的。有《香港大學中文學會會刊》（1956-1974）、《華國》（崇基書院中國語文學會，1957-1971）、《東方》（香港大學中文學會，1959-1988）、《文訊》（崇基中國語文學會，1961-1975）、《新亞書院中國文學系年刊》（新亞書院中國文學系學生會，1963-1977）、《聯大文學》（聯大書院中文學會／港大圖書館藏 1967 及 1968 兩期）、《文史學報》（珠海學院文史學會，1964-1981）、《紅樓夢研究專刊》（中大新亞書院紅樓夢研究小組，1967-76）、《文津》（崇基學院中文系系會，1973）、《新宇》（浸會學院中文系系會，1979-）和《新亞研究所通訊》（新亞研究所及所會，1998-）等。

上述雖為學生學會刊物，但其中兼包各學院中任教學者的研究，亦具重要學術意義，特別是反映了 50 至 80 年代之間本港大學生對古典文學研究的濃厚興趣和研究能力，也體現到其時學院中濃厚的研究氣氛。如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在 1962 年的專刊《文心雕龍研究專號》，由饒宗頤帶領學生做專題研究，既載有饒宗頤的專論 4 篇，師生又同做了〈原道〉至〈辨騷〉的集釋工

夫，<sup>42</sup>具現早年香港大學生高度的學術水平。而《紅樓夢研究專刊》則是由潘重規帶領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紅樓夢研究小組諸生進行的研究，持續出版十輯。柳存仁形容它是「此近歲海外研究紅學之一重要文獻也。」<sup>43</sup>

第二類主要是由院校出版的學生論文集。由 80 年代後期開始，有中文大學中文系出版的《中文系學術集刊》（1988）、《問學初集》（1994）和《問學二集》（1997），嶺南大學中文系出版的《考功集》（1997）和《考功集二輯》（1998），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也在其後出版了《清聲集》（2001）。這類刊物與第一類不同，集中的篇章經大學科系評審與選拔，意味著代表了有關學術單位認可的教研水平，具特殊的出版意義。

綜觀出版「研究」的學院刊物，可見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大專院校中有著悠久的傳統。無論院校出版的學術期刊或學生學會出版的刊物所載資料，往往出現師生研究共見一堂的情況：或學院學術期刊中時摻學生的論文，如《新亞書院學術年刊》、《聯合書院學報》、《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人文中國學報》、《能仁學報》等；或學生刊物中壯以學者論述，如《香港大學中文學會會刊》、《文史學報》、《紅樓夢研究專刊》、《新宇》等。這種資料的同源互見，透現五十年間高等學府中「研究」的生成與方向。錢穆、徐復觀、潘重規、饒宗頤、柳存仁等一代學人，在香港的中國古典文學教研基業上作出了極大的努力，他們的貢獻在這些刊物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跡。

## 四、學院刊物的「研究」

在出版的主觀意圖中，一般文化刊物的資料展示方法只須單一而淺易，以引發一般閱讀水平的讀者的興趣，增加讀者文學知識為主要任務。以上層知識分子為模範讀者的學術及半學術刊物，才載有較專精的學術討論，算是學院研究出版的社會延伸。事實上這樣的延伸，在貧窮的 70 年代前，不知抒解了多少學者和文人的生活艱困。相對之下，學院中學術刊物的資料性質更

42 饒宗頤的 4 篇是〈文心雕龍探原〉、〈劉勰以前及其同時之文論佚書考〉、〈劉勰文藝思想與佛教〉和〈唐寫本文心雕龍（景本及說明）〉。

43 柳存仁，〈讀紅樓夢研究專刊第 1 至第 8 輯〉，載專刊第 10 輯。

形嚴肅，它們講究研究方法和研究範圍的深廣度，學術價值要與各地學術界所有資料作共時與歷時的參照。這類刊物的資料減少了社會普及性質，從一個有限的系統（特定時空的香港社會）跳到一個無限的系統（中國文學研究），彰顯更深層的文化意義。

余英時指出 1949 年以來，香港作為中國學術研究的避風港，其價值是無可估計的。由於健全的法律制度，學術自由在此受到保障與支持。五十年來香港經濟起飛，教育革新，中國人文學術的研究突飛猛進，既培養了不少後起人才，也吸引了各地卓然有成的學人。他對香港的學術地位作出肯定：「如果採用國際性的眼光，我們恐怕不能不承認：香港在中國文史哲各領域內的整體貢獻，在世界範圍的『漢學』中，佔了一個相當高的比例。」<sup>44</sup> 其中古典文學研究的成果便具載於這一批學院刊物中。

如余英時所言，香港在中文學術上的貢獻，由本地培植的人才和來自各地的學人共同創造。反映在學院刊物的資料中，他們的研究在各出版範圍內呈現不同體系的學術意義，要之卻共同造就香港在古典文學研究上的整體貢獻。學術期刊是各校院系的學報和集刊，學術論文集是學術活動成果的結集。這類刊物主要展示本土和外地學者的研究，是與國際學術界接軌、交流的互動場域，是本地學術水平賴以提升的其中一個根本。學生學會刊物和院系出版的學生論文集資料，則主要是本地學術培訓的成果。這四種刊物資料的關係非常密切，考察此等刊物的出版生態和資料狀況，五十年間香港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術貢獻可得而見。

25 種學術期刊中，如前所述，絕大部分屬同人及本土學術刊物。無論在香港大學的《香港大學中文系集刊》，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學術年刊》、《崇基學報》、《聯合書院學報》、《香港中文大學學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亞研究所的《新亞學報》與《中國學人》，或浸會學院和珠海書院的《香港浸會學院學報》和《珠海學報》中，刊載的絕大多數是有關院校的師生資料。特別是 80 年代以前，香港對外的學術交流十分有限，資料的本土性與封閉的作者群是「研究」的普遍現象，而這實說明了在 50 至

70 年代之間，香港院校的中文學術培訓植根深厚。從發展的方面說，今天此地中文學術研究便是由這裡的承傳逐漸奠下基礎的。這批資料既有早期的作者群如錢穆、徐復觀、潘重規、柳存仁、饒宗頤、羅忼烈、王詔生、林蓮仙、何敬群、梅應運、蒙傳銘等，也有稍後第二代的黃繼持、黃兆漢、陳炳良、何沛雄、陳耀南、鄧仕樑、鄭健行、何文匯、陳學霖、馬幼垣、楊鍾基等。70 年代後這第二代的學者們長期任教大學院系，培養後學。他們既是早期學生學會刊物如《東方》、《香港大學中文學會會刊》、《新亞書院中國文學系年刊》、《華國》、《文訊》等資料的作者，而 90 年代後院系出版的學生論文集如《問學初集》等的資料中，作者群則是他們的學生輩了。從歷史的方面說，我們自那幾十年間積聚的資料中，可體現香港現代學術研究一個重要的生成與轉折期。50 年代初，政局動盪，由國內避亂南來的學人，不少在此講學和設立書院，他們漸漸成為此地學術界的主要力量，其中以錢穆等創辦的新亞書院成就最著。在社會經濟還未完全起飛的階段，新亞和其他私立書院在教學和文化研究上為香港作出了默默的貢獻，成為當時香港大學以外的重要學術培訓場域。60 年代由新亞、崇基、聯合組成的中文大學成立，70 年代三間書院遷集沙田。此後兩間大學的中文系共同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上發展，是為歷史性的轉折期。

與「研究」有關的同人及本土學術期刊中，今天尚出版的有《新亞學報》、《香港大學中文系集刊》、《人文學刊》、《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能仁學報》和《樹仁學報》等。除《新亞學報》外，這些刊物皆創辦於 80、90 年代。90 年代，浸會和嶺南已被納入大學系統，並各辦學報，而新亞研究所和能仁、樹仁等私立學院仍在香港的中文學術圈內作出一份貢獻。香港的社會和教育在幾十年間已經歷大變，作為民間的學術力量，它們的出版實在是值得尊重的。

現存的 12 種學院期刊中，只《東方文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人文中國學報》、《嶺南學報》及《中文學刊》為國際性學術期刊。除《東方文化》有長久的出版歷史外，其他學報的「國際化」，始設於 90 年代。90 年代，大陸學術界與外面的隔閡完全

<sup>44</sup> 余英時，〈香港與中國學術研究〉，頁 5-7。

打開，香港學術界亦經歷重大變化。高等學府象牙塔的大門被群眾急叩，一扇向內張開，接受社會的「營運」公審，一扇向外張開，引入國際的學術評核。於是學術交流的步伐加速，學術活動的舉辦增多。此時社會對學者研究的認可水平以載於有評審制度的國際性學術期刊為理想，於是學者論文外投日眾，而本地大學的年輕學報亦必以國際性為本位。從「研究」資料的意義看，這些學報兼容各地學者的研究，成為國際學術交流的一個平臺，本地學者資料的出版層次便得從而提升。然而論者研究外投成風，要追尋與描摹香港整體學術發展的全圖便變得更複雜。無論如何，直至 2000 年前，這幾份學報的資料中，作者群不再呈封閉現象，但本地院校學者仍佔頗大比數，當中不少屬第三代學者的研究，如李家樹、陳國球、劉楚華、蔣英豪、王晉光、李銳清、黃坤堯等。

余英時在 90 年代初期，曾感慨大陸對香港及海外提供的主要是原始資料，特別是考古資料，而不是學術研究的成果。<sup>45</sup> 就此我們考察五十年來香港學院期刊中的資料狀況。整體言之，研究範圍十分廣泛，各朝代、各文類、各文學經典都有專門的學者。有些資料可清晰地反映作者的專研領域，如柳存仁於小說、潘重規於紅樓夢、何敬群於詩歌、羅忼烈於詞曲、林蓮仙於楚辭、孫述宇於水滸傳、黃繼持於文學思想、鄭健行於詩學、鄧仕傑於魏晉六朝文論、何沛雄於辭賦、黃兆漢於戲曲、何文匯於詩歌格律等。就研究性質言之，則饒宗頤、柳存仁和潘重規等早年從海外搜集珍貴資料和發表論文，為傳統文獻作補白，尤其值得重視。<sup>46</sup> 其次半世紀中學者在香港做學問，承接清末以來自西方引入的現代學術研究方法，一直沒有間斷；沒有如近代中國所嘗受的由統整的社會文化思維主導學術的影響，也沒有旁入其後國內唯重典籍考據的研究主流。總的來說，資料所見研究面目是比較多樣、活潑和自由的。如果將饒宗頤和錢穆等 50、60 年代在《新亞學報》發表的〈西漢

節義傳〉（1955）、〈讀文選〉（1958）、〈讀柳宗元集〉（1958）、〈讀詩經〉（1960）等文章視為火種的話，那麼薪傳所及，到了 21 世紀，香港在古典文學專研上有了一定的成績，實有賴由他們展開的學術人才培養大業。而在 80 年代前的二、三十年間，這批資料的留存確堅實地說明了香港曾與臺灣和海外漢學界一起，在中國傳統文化一度瀕危之時，克盡了延續血脈的民族責任，故深具時代意義。

今天，大學生對古典文學的興趣大減，學生學會刊物的「自然」資料早已大遜往昔。而學術會議論文的結集和學生論文的結集都是自 80、90 年代開始的，見證了交流成果和「指導」成果的水平。一切的出版都在「專家評審」的「可靠」而「公平」的制度下運作。在新的歷史環境中，人們嚮往學科的「國際化」。影響所及，學生刊物的資料固然由過去的多元變成「樣板」，學院刊物的資料也因被一刀切的學術標準量度，由過去的自由活潑而變成「一體化」了。

總結從香港五十年間出版的刊物反映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無論社會一般文化刊物或學院學術刊物，都有著豐富的資料，堅實的內涵，並曾在近代中國文化的傳承與交流上起重要的歷史作用。歷史的任務是否完成了？薪火是否會延續下去？今後香港是否仍能成為具一定價值的古典文學研究陣地？我們應竭力保存幾份高水準的學術期刊，應創辦或復興幾份高質素的社會文化刊物，還是應輸入外來資料以作範本？時移世易，香港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是否仍有強韌的中國文化保守性，在講求「全球化」的經濟體系中，人們尤其青少年近乎盲目的向西方表層文化傾斜之際，似乎難以令人樂觀起來。但觀瞻遠景，既然前人踏出的道路已經展開，利用固有的歷史基礎作為優勢；例如長期文化開放的出版傳統、貫穿中外活潑自由的學術研究方向，加上研究成果資訊向來能得到最充分的流通，藉此打開另一新局面，相信必指日可期。

45 余英時，〈香港與中國學術研究〉，頁 7。

46 饒宗頤在《新亞學報》發表了兩篇〈敦煌本《文選》勘證〉（1958）。柳存仁在《新亞學報》發表了〈四遊記的明刻本——倫敦所見中國書目提要之一〉（1960）和〈元至治本全相武王伐紂平話明刊本《列國志》傳卷一與《封神演義》之關係〉（1959）。潘重規在《東方文化》發表〈巴黎藏毛詩訓詁傳第卅九第卅卷題記〉（1969），在《新亞學報》發表〈倫敦藏 2729 號暨列寧格勒藏 1517 號敦煌卷子毛詩音殘卷〉（1970）。